

一個人的戰鬥

——讀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

● 單世聯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

一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廣泛引進海外中國研究成果，僅專門叢書就有好幾種，但這項工作迄今為止還遠未完備，特別是不同

觀點、不同方法的論著未能及時引進。比如著名史家何炳棣先生的《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1989年就由葛劍雄譯出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經何先生建議，2000年北京三聯書店新版更名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但他的另一些論著，如《東方的搖籃：西元前5000-1000年中國新石器時代及有史早期技術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討》(*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 至今還未與我們見面。此書不但涵蓋之廣為考古學界所罕見，而且在中國文明起源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提出了許多重要論斷，否定了西方盛行的有關舊大陸農業及文化皆起源於西南亞兩河流域的觀點和理論。它的重要性，至少可以與我們比較熟悉的一些重要論著，如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張光直古史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廣泛引進海外中國研究成果，但這項工作迄今為止還遠未完備，特別是不同觀點、不同方法的論著未能及時引進。比如著名史家何炳棣的《東方的搖籃》至今還未與我們見面。此書不但涵蓋之廣為考古學界所罕見，而且在中國文明起源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提出了許多重要論斷，否定了西方盛行的有關舊大陸農業及文化皆起源於西南亞兩河流域的觀點和理論。

何炳棣認為，儘管李約瑟畢生宣揚中國文化令國人感佩，但在討論主要文化因素的起源時，李氏深潛的西方優越感，使他不免採取從西到東的激發性傳播的預設。至於張光直，錯誤更為嚴重。張認為所有原始耕作都是游耕制，仰韶人也採用所謂「砍燒法」，而何炳棣則以翔實的史料證明，在具有「自我加肥」功能的黃土地帶，自始出現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制度。

系列等互為補充。何先生認為，李、張的方法、材料和結論均有嚴重錯誤。儘管李約瑟畢生宣揚中國文化令國人感佩，「但在討論主要文化因素的起源時，李氏深潛的西方優越感，便使他不能完全冷靜客觀地做純理性的權衡判斷，便不能嚴肅地評價所有的實物和文獻的證據，便不免採取從西到東的『激發性傳播』的預設了。」(頁428)因此其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有關農業、青銅和天文三個方面的歷史解釋都是錯誤的。至於張光直先生，錯誤更為嚴重。比如他認為所有原始耕作都是游耕制，仰韶人也採用所謂「砍燒法」，而何則以翔實的史料證明，在具有「自我加肥」功能的黃土地帶，自始出現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制度。他指出：

張光直60年代初撰《古代中國的考古》時，完全不知利用中國地質方面不少篇華北土壤各層的孢粉分析報告。我有關中國農業起源中、英論文和中文專刊陸續問世之後，他才不得已多少用了一點此類資料以求補救他的看法。最不可思議的是他仍然完全不用華北黃土地帶不少地點的孢粉分析，偏偏只引用遼東半島普蘭田和台灣某地的孢粉分析，冀能證成他華北濕潤多林木古自然環境的立論。生平所遇，偏見如此之深，思維如此疏失的學人實在罕見。(頁402)

中國文化的起源是個大問題，不同方法和觀點之間完全應當展開競爭，誰是誰非需要進一步研究，但一面是李、張之書一版再版，另一面是何著無由得讀，這就可能導致

我們對海外中國研究成果乃至對中國古史的片面了解。

二

古之作者，於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後，通常會別作一篇，述先世，敘經歷，發凡例，明指意，附於書尾，俾使後人知人論世、評論得失。雖然，何先生老當益壯正以其畢生之學集中闡發華夏文化的「宗法基因」，我們也期待他在思想史研究領域迭有創獲、不斷奉獻，但一個年逾八十、成就顯赫的老人無疑可以也應當回首往事、總結一生，以其豐富的經歷、深湛的學思啟示後人。

首先，何先生在回憶錄中大量敘述其家世背景、校園生活、社會交往、學術形勢、學術論爭等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美社會文化方面的材料，對於研究現代中國文教史、海外中國研究史具有重要價值。比如1930年代北平學潮洶湧，何先生以當事人的身份指出：「30年代的清華教授和多數學生卻都認南京政府是唯一有組織的抗日力量，而學生會和北平學聯等之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動，正是為了削弱和顛覆這個力量。」(頁89)

其次，何先生的回憶錄是其史學研究的繼續和深化。1950年代末，何先生根據明清兩代登科進士錄、進士三代履歷、同年齒錄等最精確的原始史料研究明清社會流動，發現明清五百五十餘年間，三品以上能享有「蔭」的特權家族的子弟所佔進士尚不及百分之一，可見世家大族無法防阻其長期「下向」流動。但後來美國研究中國家庭

制度的重要學者，如著有《政治家與士大夫：兩宋江西撫州的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1986) 的海姆斯 (Richard Hymes) 和著有〈帝制中國晚期通過科舉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重生〉(“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1) 的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等人卻突出家族、婚戚對向上社會流動的功能，並批評何先生低估了家族的積極功能。在回憶錄中，何先生除根據史料進行反批評外，更以自己的家世證明家族功能的有限性。金華何氏一門四房，何先生的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都是早期的官費留學生，前者曾任暨南大學校長，後者官至上海市副市長，是何氏家族的「英雄」和「砥柱」，但「以何炳松在自由職業裏地位聲譽之高，他只能負擔本房侄兒女的生計，……德奎收入最高，能援引長房以外四房的族人為工部局小學教員，主動惠及遠在平津的第三房的小堂叔。但他主要支援的還是長房堂弟德華。」「回到帝制晚期，族中最成功者都無法保證本房本支每一世代都能通過科舉而延續其成功(事實上大多數都是不能的)，又怎有無邊法力澤及嫡堂、再堂、五服內外的同姓者們呢？」(頁24-25) 所以一個家族能否維持或改進其社會地位，最主要的還是看族中有沒有傑出的新血。「我希望本章『附錄』中金華何氏一族四房情況第一性的追述能有助於正確了解近現代中國家族的功能及其限度。」(頁29) 學者的回憶錄從來都是不只

屬於學者個人，但像何先生這樣把個人的身世經歷與其所涉及的史學論域內在一起來的卻不多見。

第三，何先生的回憶錄啟示了一種治學的門徑。何先生治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的幾項重大研究，無論是1952年研究揚州鹽商、1953年研究美洲作物傳華考，還是1958年研究明清的社會流動、1964年研究北魏洛陽城，甚至晚年轉向的思想史等都是由偶然因素觸發的。同行學者的一個觀點、讀書所得的一條史料、學界注重的一個概念等等，這些偶然因素之所以成為深入研究和重大成果的誘導，恰恰說明學思之道不在直接感興和一時靈感，而在於高度自覺的史學意識和長期積累的探索能力。史學中人多能接觸何先生看到的那些論著，但只有何先生目光如炬，迅速由一兩點暗示舉一反三，擴大為專題研究，解決了一些關鍵問題。所以重要的不是那些偶然的、意外的因素，而是艱苦的學術訓練、緊張的問題意識、堅實的史料基礎等這些基本的治學訓練。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有云：

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其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何先生學思研撰的歷程證實了這一點。

所謂「立志須高」，就是做第一流學問、成第一流學者。何先生幼

何炳棣的幾項重大研究，無論是1952年研究揚州鹽商、1953年研究美洲作物傳華考，還是1958年研究明清的社會流動、1964年研究北魏洛陽城，甚至晚年轉向的思想史等都是由偶然因素觸發的。同行學者的一個觀點、讀書所得的一條史料、學界注重的一個概念等等，都可以誘導深入的研究，這也在於他高度自覺的史學意識和探索能力。

讀史閱世六十年，始終縈繞於何先生心頭腦際的是「第一流」、「最高水平」、「大課題」這些概念。史學首先靠材料說話，他的每項研究幾乎無一不是對大量多樣史料的嚴肅考證與綜合。轉入國史，研究人口史時，他以三個夏天翻遍了三千種方志和三、四百種善本方志膠片。

承庭訓，少年時代其父就激勵他的爭做一流的上進心。從蒙學到博士，從中國到美國，他受到了當時條件下最好的教育。一旦入門，他就抱定兩個願望：

首先是通過廣泛的閱讀與師友們的討論，盡力了解國際上哪幾位近現代史學家代表史學研究的世界最高水平。緊接着博士後全部投入國史研究時必要跳出「漢學」的圈子，以西方史最高水平為尺度，並以自己國史研究的部分心得盡快地嘗試着打進西方歷史及社會科學方面第一流的期刊——這才是國史研撰較高較難的試金石。(頁10-11)

讀史閱世六十年，始終縈繞於何先生心頭腦際的是「第一流」、「最高水平」、「大課題」、「第一等重要問題」這些概念。優秀的學者不少，用功的學者很多，但始終如一地以最高標準要求自己並確實如其所願地成就自己的極少。學術的世界豐富廣大，不是每一個學者、事實上也不需要每一個學者都以第一流自期，讀者社會也需要很多優秀的普及性論著，但只是因為有了像何先生這樣第一流的學者和第一流的學問，學問的魅力和學者的價值才真正體現出來，知識和文化也才能得以精進發展。

所謂「入門須正」，就是嚴格的史學訓練。史學首先靠材料說話。「個人生平不同階段的主要著述真正的骨幹，幾乎無一不是對大量多樣史料的嚴肅考證與綜合。」(頁490)何先生之所以選擇十九世紀英國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土地政策為博士論文題目，重要原因之一是哥倫比亞

大學收藏有關資料相當完整。轉入國史後，何以廣義的人口史為研究對象，也是因為美國的國會、哥大和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方志類圖書收藏特別豐富。他說：

傳統學人中以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參閱方志最多，據他《肇域志》的序言和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他一生確曾閱讀過千種以上的各省地方志。由於美國各大圖書館高效系統的收藏和使用上的便利，我以三個夏天基本上翻遍了三千種方志和三、四百種善本方志膠片，較之古人，真是幸運得多了。(頁279)

有了史料還有一個如何使用史料的難題。何在方法上特別注重考辨概念的歷史涵義，強調對於傳統概念不能望文生義，不能輕易接受今人的概括。比如他對清代的「丁」、「畝」兩個概念的革命性解釋過程是：

縮印本雍正1735年《浙江通志》有關戶口田賦諸卷中，全省77縣縣名之下，四分之三以上的縣份都有小註「隨糧起丁」或「隨田起丁」。這類小註，加上平素獲得有關明清賦役第二性的知識，使我立即作出初步判斷：清初的「丁」無論是各省府州縣的細數或是全國的整數，都已與成丁無關；前此所有中、日、西方根據清初「丁」數推測中國人口的專家學人們，都是方法上根本錯誤的。(頁273)

即使對於思想史這樣似乎討論抽象問題的領域，何先生也認為要真正回到歷史，「歷史學家決不應

允許哲學和哲學史家極力『淨化』儒學而置儒學長期的政治社會實踐於不顧。」(頁448)

三

應當說，對於一位成就卓著的史家來說，「入門須正，立志須高」只是主觀願望和基礎條件，在此之上還得有融會貫通、縱橫解釋的綜合能力。史料龐雜，只有全局在胸才能在歷史上下文中判斷其真偽和價值；往事朦朧，只有具備很高的綜合能力才能從片言隻語中搞清線索、提出大問題。何先生把綜合稱為向「大處」進軍：「在我鍛鍊思維的關鍵歲月，清華歷史系已甩掉國學中過於繁瑣考證的桎梏，供給我一個清新的文化園地去往『大』處想，至少初步向『大』處夢想。」(頁73)何先生對「綜合」的理解，約有三義。第一，治史須兼治社會科學。受清華時代蔣廷黻先生的影響，何先生在海外決心不走漢學的之路而力求進入社會科學園地，他對明清社會流動的研究多採社會科學的概念和方法，而其有關美洲作物傳華考的論文就「已在植物學史上贏得了一個不算太小的永久地位」。第二，治史須進行文化比較。何先生在清華的導師是精於考據的陳寅恪先生，但他更為心儀且終生欽佩的卻是雷海宗先生驚人的綜合能力。「回憶清華和聯大的歲月，我最受益於雷師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傳統中國文化消極面之『深』。」雷先生的「大」就是其根據並修正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化形態史觀」，比較

各大文化的同異，把握中國文化的特徵。「治中國通史不能僅憑傳統經史的訓練，必須具有近現代世界眼光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頁119)第三，治史須有多維平衡思考的能力。即使是考證，何先生也認為：

突破性的考證有時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與擴展考證視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還是平素多維平衡思考的習慣。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古史辨》高潮中，老子年代始終是先秦思想史上最大的「障礙」，主要是因為有些「大師級」的學人們思考之單軌與見解之偏頗。(頁489)

與這三條史學方法相應，何先生在史學上的綜合大略也有三種類型。

一是跨學科的綜合。人類歷史前後呼應、左右關聯，雖然其間充滿後現代所「考古」出來的矛盾、游離和斷裂，但即使這些也須在一個整體聯繫中才凸顯出來。史學是一門綜合貫通之學，必須從各有關學科中吸取營養。何先生對古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制度及農業史等等，均有深入研究，且以專長「宏觀史論」著稱。以〈北魏洛陽城郭規劃〉一文為例，在確定了洛陽的規模和建置，提出北魏最後劃定的三十方英里的「大洛陽」的全部城郭，為隋唐都城設計者採為城垣所圈的總面積的結論之後，他進而分析北魏洛陽的坊里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不同社會經濟性能的全盤都市設計：「北魏遷洛同年之中，孝文帝下詔『制定姓族』，換言之，即是將鮮卑和漢

史料龐雜，只有全局在胸才能在歷史上下文中判斷其真偽和價值；往事朦朧，只有具備很高的綜合能力才能從片言隻語中搞清線索、提出大問題。何炳棣把綜合稱為向「大處」進軍。何先生對「綜合」的理解，約有三義。第一，治史須兼治社會科學。第二，治史須進行文化比較。第三，治史須有多維平衡思考的能力。

何炳棣是少見的能對中外歷史作專題研究的史家。他把十六世紀美洲的花生、玉蜀黍、番薯、馬鈴薯傳入中華，稱為中國第二次農業革命。它上承北宋初葉由早稻傳播和增產而形成的第一次農業革命，下接康乾「輕徭薄賦」、「開明專制」的穩定局面，使中國人口從乾隆時期的2.75億迅速增加到道光朝的4.3億。

族的統治階級通盤地門第化、世襲化、品級化。……北魏洛陽坊里制中呈現出相當嚴格的階級和身份的區分，自是情理中事。」(頁373)唐宋以降，閥閱制度漸次削弱，階級身份已趨流動，「故汴京里巷之間，第邸同闌市毗鄰，仕宦與庶萬肩擦，身份行業區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里遺意盡失。甚至里巷形狀面積亦無復後魏隋唐之整齊規律。」(頁374)這種既關照洛陽城郭在其前後時代中縱的線索，又考察它與其他同時代一切有關的政治、經濟、制度等之間的各種可能的橫的關係，正是章學誠所謂：「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

二是跨文化的綜合。何先生是少見的能對中外歷史作專題研究的史家。「也許由於當年學習西史相當認真，我於國史選定研究對象之後往往先默默地作兩種比較：與西方類似課題作一概略的比較，亦即所謂不同文化間(intercultural)的比較；在同一國史課題之內試略作不同時代的，亦即所謂『歷時』(diachronic)的比較。」(頁488)很多研究因比較而視野開闊、新論迭出。比如《清實錄》中廣東省在呈報田地沙灘的頃、畝數字時，前面都加了一個「稅」字。「這一小小發現立即引起我極大的好奇心；這些頃畝數字並不代表真正的耕地面積，很像是經過折算後入冊的『納稅畝』數。」(頁274)何先生之所以在「速翻」《清實錄》時即對「畝」有「革命性」解釋，得益於他對英國史的了解。據英國十一世紀法令，田地最大的納稅單位是海得(hide)，即120英畝(實際數字各地相差很大)。這原是

篇幅較大的英國史都會講到的英史常識，一般中國史學者也許不會對此完全無知，但他們沒有想到英國史的材料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清代的土地制度，只有對英國史爛熟於心的何先生才能觸類旁通，一舉確定清初的「畝」數並不代表真實的耕地面積而是納稅單位。同樣，在評論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時，何先生認為張對「紳士」的定義是不準確的，「因為構成他所謂的『紳士』的最大多數底層的『生員』，在清代民俗上和小說裏往往被譏笑為『窮秀才』。這與近古和近代英國的gentry(被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大師伏爾泰認為是法國社會所沒有的『亞貴族』地主階層)，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上實有天壤之別。根據《大清會典事例》等官書，張所謂的『紳士』的總數尚可勉強推算，至於他們的財產，甚至他們大多數是否有財產可言，根本無法知道。基本數據既如此殘缺，紳士的定義又如此欠通，怎能嚴肅地進行紳士收入的研究？」(頁301)可見，研究中國紳士也要了解西方紳士，否則從搜集材料開始就可能出錯。

三是詮釋學的綜合。史學研究不可能在所有材料都搜羅齊備、所有史實都考證清楚之後再下宏觀判斷，除了據可靠史料鑑定史實，盡可能重建歷史真實外，史家也要發揮主觀的價值及其對時代問題的感受，解釋基本史實的內在關聯，說明歷史的變化與發展。易言之，理想的史學既「證」且「疏」，如此方能「通古今之變」。以何先生對兩淮鹽商的研究而論，主題是考釋兩淮食商的生產及銷售組織、估計場商、

總商及運商的數目以及全體鹽商的利潤和財富，在這些問題都清楚了之後，何先生進而追問：何以這個資財雄厚的商團不能產生資本主義？他認為，首先是兩淮鹽商與其他社會的「新富」往往犯有「炫耀式消費」的心理情結，其次是鹽商子弟中中試成為進士、舉人、生、貢的人數愈來愈多，家族成員中經商的比率愈來愈小，巨富之家財很少能保持到四五代之上。再次，「傳統中國社會裏最不利於資本積累的基本因素——兩千年來無論貴族或平民，財產繼承諸子均分的法律、制度和習慣。」（頁285）同樣，「美洲作物傳華考」本是一個農業史問題，但何先生一旦考定十六世紀前半葉美洲四大作物花生、玉蜀黍、番薯、馬鈴薯傳入中華，對中國旱地利用及雜糧生產貢獻巨大之後，他便合理地推斷，這是中國近千年第二次農業革命。它上承北宋初葉主要由早稻的傳播和增產而形成的第一個農業生產革命，下接康熙開始的「輕徭薄賦」、「開明專制」所造成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局面，使得中國人口從乾隆四十四年的2.75億迅速增加到道光三十年的4.3億。人口既然激增，資源便顯窘迫，經濟則陷入困境。何先生認為，今天長江上中游地區植被破壞引起的水土流失，可能應歸咎於十八世紀種植玉米的農民對山地的無情榨取。這就是說，困擾着近代中國的人口過多和普遍貧窮的問題，在道光三十年已經存在，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洪水、乾旱、沙塵等等都有歷史的原因。清初文人魏禧有「考古以證今」之論，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古為今用」，但何先生的

人口史研究確實憑藉其合理的解釋和推論「通古今之變」，為認識中國困境提供了新的視角。

四

讀其書想其人，何先生的學問生涯是完美的、令人羨慕的，卻絕不是輕鬆悠閒的。出乎意料而又不難理解的是，何先生多用軍事術語來描述其學術上的努力，如「打進第一流期刊」、「打進第一流學府」、「打出『漢學』藩籬」、「打進社會科學園地」等等。中國史研究不能算是海外「熱門」學科，惟其如此，從事此一研究的多為優秀學者，加上資料豐富，學術自由，所以競爭激烈，欲達到國際最高水平確乎是一場戰鬥。從少年立志到青年發奮，從壯歲苦鬥到暮年再戰，何先生敢於戰鬥、善於戰鬥，最終贏得了勝利。學者的戰鬥是一個人的戰鬥，輝煌的背後是寂莫、忍耐、甚至憤鬱，何先生喜歡用的一個詞是「孤軍作戰」——但他所收穫的，卻屬於全部炎黃子孫。中華復興賴學術，戰鬥正未有窮期，何先生的暮年回憶召喚着更多的人來繼續這種「一個人的戰鬥」。

中國史研究不能算是海外「熱門」學科，欲達到國際最高水平確乎是一場戰鬥。何先生多用軍事術語來描述其學術上的努力，如「打進第一流期刊」、「打進第一流學府」等等。學者的戰鬥是一個人的戰鬥，何先生喜歡用的一個詞是「孤軍作戰」，他的暮年回憶召喚着更多的人來繼續這種「一個人的戰鬥」。

單世聯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著作有：《西方美學初步》、《紅樓夢的現代解釋》、《法蘭克福學派史》（譯）、《反抗現代性：從德國到中國》、《現代性與文化工業》、《革命人》、《現代中國思想的德國淵源》等及文化批評文集十餘種。